

#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传记的出版价值

汪泉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510260)

**【摘要】**城市传记是在全球化、城市现代化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以广州为中心的大湾区城市传记其特点体现于书写地方性记忆与精神和建构大湾区城市文化认同。对一个城市立传,进而为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立传,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传记;大湾区;文化认同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立,珠三角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城市群文化研究的兴盛,以城市 and 城市群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将会随之越来越多,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正在兴起。

近年来,如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叶兆言的《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为代表的城市传记相继出版,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这几部作品的书写方式与人物传记相似,以史实为基础运用文学手法进行写作;它们的作者也倾向于以传记方式命名,“为一个城市写一本书,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撰写一部人物传记。一个地方可以获得某种想象出来的人格特征,乃至获得某种性别,并成为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角色。”<sup>[1]</sup>

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以《广州传》为首发,进而为整个大湾区的城市群立传,在集体记忆下追溯城市历史,构筑文化认同。本文尝试在此背景下,浅议城市传记的定义、特点、价值。

## 一、城市传记的缘起

城市传记与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城市群的构建密切相关,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标准化、模板化日益引发人们的担忧,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导致本土文化与传统的消解,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地方文化的关注与保护;伴随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导致了老建筑被大量拆除或重建,熟悉环境的剧烈变动使得人们有了迷茫彷徨之感,转向对城市文化、人文传承、老建筑、古城址位移历史、旧故事、城市名人,以此作为寻求自身文化根脉的认同、应对社会转型和变化的措施。

城市传记,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创作与出版行为,是在全球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的记录与还原,构建城市认同与文化寻根的需求促使这一新的写作形式的诞生。而将文化背景大概相同的城市群放在一起创作、出版一个系列的城市传记,使得各城市传记互相影响、文化记忆互为印证、必将集中为城市群相通背景的文化构建起到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广州传》为例。广州作为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国际化大都会,记载其发展历程与城市变迁的史书、县志,分析其对外贸易、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论文、理论著作不胜枚举。《广州市志》《广东通志》《广东新语》《番禺县志》《广东城坊志》等历史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史料。但目前尚无一本面向大众的全面讲述广州城市史的通俗文学读物。而有着独特历史文化底蕴的广州,也亟须一部属于自己的传记。作者叶曙明先生通过梳理、研究大量文献与相关史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挖掘历史细节,梳理历史脉络,以文学的手法再现了广州从新石器时代到1949年的两千多年时光为其民生历史与独具特色的文化作注。

作为非虚构的文学传记,纪实性是基本要求,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拼接,必须言之有物,但与一般的历史文献不同之处在于,文学性是传记的典型特征,在传记中,作者可以选择、嫁接,在文字中渗透自己的情感、合理想象与合乎逻辑的推理,作者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得以再现,以传递作者的表达走向,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全书开篇优美宏阔,一如长篇小说般气象万千,写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伐岭南,史料引用与现场描述两者过渡相当自然,几乎没有被史料艰深所拖累,反倒转用小说笔法。著名文艺评论家江冰先生评价《广州传》时道:“专家津津乐道的‘互文性’,被作者运用得相当娴熟,举重若轻,而且过渡自然,情绪节奏叙述方式已然水到渠成之境界。”

## 二、城市传记的文体界定

英国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评论《伦敦传》说:“这是一本历史书,却写得像一篇散文;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却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样的严肃枯燥;它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的,却能够潇洒自如,趣味十足,仿佛是在写一个个故事。”

从钱乘旦教授的这番话我们如何界定城市传记的文体呢?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

在古代,方志作为记录城市风俗、物产、舆地、历史以及故事传说等的官方文本,讲究严肃性与真实客观性。另一种则是小说,小说不像方志那样枯燥刻板地记录城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地理、官职、艺文、奇闻等,而是采用更为灵动、散文化的文字去展现城市的鲜活与烟火气。如果说方志是用历史的手法记录城市,那小说则是以文学的手法描绘城市。

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城市故事”系列,包括《伦敦传》在内,还有《芝加哥规划》《芝加哥规划:丹尼尔·伯纳姆与美国城市的再造》《巴黎城建史》以及“意大利四部曲”《威尼斯故事》《西西里故事》《佛罗伦萨故事》《罗马城故事》。从这一套书的定义看来,前四者似乎不仅仅是故事,而是历史,而后四者却是真正的故事,那么故事是否包含虚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据书名可以判定,是Story,非虚构;而不是Novelist,虚构的小说,那么,它当然算不上历史学术著作,应该是不折不扣的非虚构作品。

那么城市传记就是在方志和小说的基础之上,将“传记与方志的写法结合起

来,以传记方式书写方志对象由此为城市树碑立传,如是书写是对城市进行的一种文学性、纪传体的写作。”<sup>[2]</sup>城市传记是以文学的形式处理历史,希望能够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实,不是一板一眼的还原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文学意义上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甚至以小说的技法,去合理推理、想象,从而将城市历史文化转变为城市的人文记忆。城市传记表面书写城市历史,实则是通过合理的想象与书写完成城市记忆的再现与还原,从而人文的重构,在历史非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中同构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城市传记,既描绘了城市历史又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又根据城市的过去与现实重构自身内涵,形成大众的城市记忆,进而引导城市认同。

## 三、大湾区城市群传记的价值和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成立的基础除了地理意义上的便利之外,另外就是湾区十一个城市在文化上的认同,在不同时代,湾区城市群的行政管理、文化形态、生活习俗、交流互动都有广泛而未割裂的历史,所以,城市群的传记自然也存在以上的相通基础,而《广州传》的出版本来就已经具备了在文化上引领湾区城市的意义和前提。

广州要以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担当发挥核心引擎作用,不光是在经济、科技领域,也要在文化领域牢牢发挥中心作用,利用大湾区地域相近、文脉相通、血脉相连的优势,推动粤港澳文学界融合发展,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讲好湾区故事,推动融合发展,提升湾区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为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立传,引导整个大湾区形成群体的文化认同,创作出一批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文学精品。

### 1. 书写大湾区地方性精神

城市传记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建构地方性精神。地方性既包含地方所具有的空间含义,又特别强调地方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符号,地方性精神在地方文化观念和特定思维方式影响下逐渐形成,同时又以理性形式影响着地方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sup>[3]</sup>人们能够感受到对这个地区的精神依赖,而通过文学与艺术,能够深入心灵与情感将人与地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书写城市群及地方性精神的重任就落在了以城市传记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上。

地方性精神体现了人与城、城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不同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条件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城市文化,文化背景类似的地区形成类似的城市群文化圈,人们的生产活动互相影响,又孕育出相应的城市群文化,使得一座城市、一个城市群展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气质特征,进而成为城市的文化核心,引导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产生文化认同。大湾区城市群传记对内可构筑湾区精神、凝魂聚气;对外可积极塑造湾区形象,讲好大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以湾区故事折射中国故事,进而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贡献力量。

### 2. 建构大湾区文化认同

城市文化是城市传记的书写基础,它本身就说明自己不同于其他城市。大湾区城市地脉相通、文脉相近、血缘相亲,城市群有共同之处,又各有历史渊源和城市特色。生活在大湾区的人们在城市的活动创造出了相应的文化,城市文化也反过来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与思想观念,人与城市文化互相影响,相辅相成,难以分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传统文化观念被摧毁,新与旧的割裂冲突导致了个人身份的迷茫,对于自我认同的焦虑已经成为困扰当代人的沉痾。城市传记将个人与城市缝合起来,个人的生命与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结,个人的发展需求与城市的进步需求相融。城市传记和城市群系列传记正是利用这一点建构人们的社会认同。

以《伦敦传》《南京传》《广州传》为首的一系列城市传记已经陆续问世,《香港传》《澳门传》《中山传》《佛山传》《肇庆传》《惠州传》《潮州传》等也正陆续推出。因此,为大湾区城市群立传,意味着对城市群的文化集体塑造,不仅大湾区整体形象展示具有标杆性的意义,更是在聚合大湾区的城市文化,引导大湾区整体的文化认同。

## 四、结语

城市传记是在全球化、现代性与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是在方志与小说基础上进行的文学而非历史式的创造性书写。以广州为中心的大湾区城市传记的诞生,有助于在建构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建构大湾区城市群的地方性精神,既能够应对全球化与现时代性带来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将个人认同与城市缝合,为文化认同建立基础。对一个城市立传,进而为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立传,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澳]安东蓓.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M].李霞,译,李恭忠,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1-8.
- [2] 芦坚强.昆明形象的文学书写[J].学术探索,2015(2):140.
- [3] 芦坚强.城市传记:城市记忆书写的表意实践[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16.